

● ● ● ●
兵败退台
清除异己
子承父业
革新行政

反攻何待
权术不衰
蒋家一统
图强有法

李松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蒋氏父子在台湾

下册



蒋氏父子在台湾

(下)

李松林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蒋氏

父子

在台湾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蒋氏父子在台湾 (下)
作者 李松林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规格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9.5 印张 255 千字
版次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670-5/G·42
定价 15.90 元 (共二册)

目 录

下篇 蒋经国在台湾时代

一	出掌“行政院”	(2)
	出任“阁揆”	(2)
	“革新”行政	(11)
	“实质外交”	(18)
	十大建设	(20)
	平民作风	(27)
二	子承父业	(30)
	“继统”	(30)
	“政通人和”	(35)
	中坜事件	(39)
	《美丽岛》案	(42)
	台、美断“交”	(47)
	第七任“总统”	(52)
三	统一中国论	(58)
	一国两制	(58)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62)
	统一之声	(70)
	和谈契机	(73)
四	接班危机	(81)

放手第三代抓权	(82)
踢开王升、蒋彦士	(92)
托孤	(97)
江南被刺	(103)
丢车保帅	(106)
集体接班	(111)
五 “向历史交待”	(118)
政治革新案	(118)
民众参政意识升高	(123)
体制弊端	(126)
美国施压	(131)
革新暗潮	(135)
六 解除戒严令	(139)
党外势力的崛起	(139)
打、拉结合	(143)
“政治沟通”	(145)
默许	(149)
围绕《国安法》之争	(152)
开放党禁	(159)
七 开放大陆探亲	(163)
晚年抉择	(163)
老兵呼声	(168)
突破禁令	(171)
折衷方案	(175)
八 突逝	(180)
健康亮红灯	(180)
轮椅上的统治者	(181)
突逝风波	(183)

“伪造遗嘱”	(186)
李登辉接棒	(189)
荒乱中的蒋氏家族	(194)
岛外反响	(195)
从移灵到奉厝大典	(196)
九 身后政局	(201)
李登辉的政策走向	(201)
高层政争激化	(204)
“台独”猖獗	(214)
十 蒋家难起	(218)
宋美龄节节败北	(218)
蒋纬国权力受阻	(223)
第三代有行情	(232)
附录：蒋氏父子在台湾大事年表	(238)

下 篇：

蒋经国在台湾时代

一 出掌“行政院”

出任“阁揆”

1972年2月，正当蒋家小朝廷处于“外交”大溃决之际，6年一度的选举闹剧又在台岛上演。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一番推托之后，五度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此际蒋已是风烛残年，自思来日无多，遂推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阁揆”，真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对于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相当多的海内外舆论认为是“家天下”的突出表现。香港著名评论家龙中天的说法颇具色彩：

“大约是民国45、46年（1956—1957年）之间，台湾社会上出现了一本由前清天监丁紫霞编印的……《人生宝鉴》，”其内容是“历代的符谶大全”。其中一篇为《黄药禅师预言诗》，诗云：“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赤鼠时同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又见南军至，时到金蛇赤运终”。

此诗当时被许多人解释为“应验在蒋经国和大陆中共”。“老实说，在1956—1957年时候，有人向我出示紫霞这一本谶书，我看了是持保留和怀疑态度的”。“在民国61年蒋中正当选连任第5任总统之后，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确使人有着‘中兴事业付麟儿’的感觉”。因为，“这8句的第一，解释为蒋公把中共事业付托给蒋经国；第二则是‘耀德仪’（谐意：要得意）的时间：在‘豕’（猪）年后‘牛’年前（豕后牛前），就是‘子’年了。果然，民国61年，阴历任子年蒋经国先生做了行政院长，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来说，行政院长依法为政府的最高行政

首长，用‘耀德意’3字来形容，自也十分贴切”。^①

显然，此种说法纯系迷信色彩，作者意在宣染蒋经国子承父业符合“天意”。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的一生》作者漆高儒则认为上述观点不妥，他说：

“一般来说，都说经国先生子承父业，是蒋公的继承人，这话有点似是而非，实际上经国先生在政府中担任较高的职位，都是有人推荐的。看了经国先生的历练过程，何曾有‘家天下’的情况，若说蒋公微有照顾，并不损失民主国家的表现，如美国肯尼迪总统，便任命其弟为司法部长。我国古有明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民主国家的领袖，无论内举或外举，还一定要有法定程序，要经过好几道考验关口，并不是什么‘金口银牙’下一道‘圣谕’便了事，所以父传子、子传孙、‘子孙帝王之业’的事已经没有了。经国先生的工作岗位，并非世袭而来，乃是‘国人皆曰贤’、‘爱拼才会赢’的条件下出头的”。

漆高儒此言实在令人诧异，蒋经国出任“阁揆”的确是其父蒋介石的精心安排，而不是什么“微有照顾”，也不是什么有人“推荐”，更不是什么“国人皆曰贤”。如前所述，蒋介石提名无班底、并以“推事”著称的“好人”，但不是“好官”的严家淦就任“副总统”，正是他传子部署的重要一环。严家淦当选“副总统”后，虽然仍兼任“行政院长”，但不久就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推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他把大权统统交给蒋经国掌管。1972年3月严家淦连任“副总统”后，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并推举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继任人选，声称“此自为政府当前最适切亦需要之举措”。一届五次“国民大会”召开期间，一些“国大”代表秉承蒋介石旨意，联合上书蒋介石，呼请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上书曰：

“蒋经国先生志行高洁，器识宏通，气魄雄厚，襟怀谦冲，在以往

^① 龙中天《蒋经国来台后的几个时代》，载石玉《蒋经国在台30年》。

数十年献身党国之奋斗中，凡所作为，皆有极卓越之成就。因此博得国际称誉……实乃当前主持政院之唯一最佳人选。在昔钧座谦仰为怀，未尽发挥其才猷，诚为国家的损失，今当面临空前之变局，宜有大开阖之作风，似不必有所瞻顾”。^①

1972年5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会议，讨论蒋介石交议的严家淦“内阁”总辞职案，并讨论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会议作出四项决议，其中第三项是：

“蒋经国同志，忠纯宏毅，早岁经历地方行政，并从事中央党政，已著忧勤，近年主持国防建设，充沛三军战力，出任行政院副揆，从容肆应世局，而综绌财经，留心工农福祉，领导青年，培植国家新锐，尤深为国人所寄望与推重，当此大敌未靖之际，信如严家淦同志所推举，蒋经国同志确为今日主持国家行政最理想之人选，中央常委会谨一致吁请总裁不以内举之微嫌，废国家兴复之至计，允即召蒋经国同志出任行政院长”。^②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其实中常会是奉蒋令行事。这样，他就可以举亲不避嫌了。5月20日，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按照一般程序：新任总统就职前，旧任“行政院长”、副院长、“政务委员会以及各部会主管人员先行辞职，由新任“总统”任命“行政院”院长，并咨请“立法院”同意，另送请国民党中常会同意，“行政院”正院长必须为中国国民党员，蒋介石送交“立法院”的咨文是这样写的：

“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引宪

① 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第179—18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② 陈布公《新编中国现代史》，香港文史出版社1981年版。

法第 55 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①

“立法院”接到蒋介石的咨文,不敢怠慢,5月26日举行投票,408名“立法委员”到会,蒋经国以381票当选为“行政院长”。6月1日,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接到委任状之后,立即发表施政方针说:

“在此世局变幻,国家殷忧的时刻,承担艰巨,内心深感惶恐”。但是,经国要以“国家利益为本,民众利益为先,誓必排除万难,消灭叛逆中共”。并“愿以守法纪,负责任,推进廉能政治,来和全体行政人员互勉互励,共同实践……总统所昭示的‘国民革命再北伐,中华民国再统一’的时代使命”。^②

蒋经国发表施政演说时,慷慨激昂,确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正可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对于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评论颇多。一些文人墨客和台湾舆论纷纷为蒋经国登台捧场或寄以厚望。陶百川一段话显现出各界对蒋经国期盼甚殷。陶说: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但如果真能加强谦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③

蒋经国在出任“行政院长”之后,为显现出新人新政,首先在组“阁”时,进行大胆改组,起用了不少新人。新的“内阁”成员名单是: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行政院”政务委员:叶公超、连震东、俞国华、李连春、周书楷、郭澄、李登辉

① 江南《蒋经国传》。

②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8辑。

③ 陶百川《廉能之治与志士之气》,载《联合报》1972年5月28日。

“内政部长”林金生

“外交部长”沈昌焕

“国防部长”陈大庆

“财政部长”李国鼎

“教育部长”蒋彦士

“司法部长”王任远

“经济部长”孙运璿

“交通部长”高玉树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信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

蒋经国还任命费骅为“行政院”秘书长，周宏涛为“行政院”主计长，赵聚钰为“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谢东闵为台湾省主席，张丰绪为台北市长。

对于新的“内阁”名单，台湾《联合报》评论道：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台湾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台湾省政府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发掘，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种新观感，一种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士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长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

县之长而跃任台北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①

江南对蒋经国内阁也评论说: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 61.8 岁”。^②

蒋经国为何一上台,便在人事安排上一反以往老官员轮流坐庄的办法,而大胆地输入新鲜血液呢?

其一,化解“省籍”矛盾。“省籍”问题是国民党退台后政治舞台上斗争的一个焦点。国民党退台初期,台湾本土人甚至一些在岛内知名度较高之人,参政的机会也很少,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台湾“省政府”的要职,基本上是由去台的大陆籍国民党要人担任。台湾“省主席”一职直到 1972 年的 23 年间,竟无一台湾人士出任。随着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台湾人士参政要求越来越强,纷纷要求“改革开放”,打破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实行权力重新分配。1972 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面对台湾社会矛盾发展,国民党出现政治危机的局面,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行“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路线。因此,调整权力结构,扩大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提出通过推行“年轻化”、“本土化”政策,大量起用和擢拔台籍“青年才俊”和有“地方基础”的台籍官僚,使国民党政权开始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转为同台湾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什么是“本土化”政策呢?台湾及海外的一些报刊众说纷纭,从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本土化”是指本土上自然融和的文化,含有“改流归土”之意;就狭义而言,“本土化”是指以台湾为发展中心的意识观念和做法,含有“根植台湾,对抗大陆”之意。一般理解有两层意义:一是指政府机关人事,增

① 《联合报》1972 年 5 月 30 日。

② 江南《蒋经国传》。

加台籍人士的比例；二是就台湾与大陆关系而言，加强对台湾的认识，以台湾为发展中心。从实质上讲，“本土化”政策就是“台湾化”。

蒋经国并非是“本土化”政策的创始人。在国民党退台初期，国民党当局虽制造“省籍”矛盾，但为了稳定混乱的政局与平抑物价飞涨的局面，也曾在其政权结构中延揽若干台湾知名人士参政，诸如连震东被吸收进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早在国民党退台之前，蒋介石就曾给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打电报，令其多方延用台本地素高之人参加政府，特别要“培植台湾青年”，以化解因 2·28 事件所造成的民怨。此后，在陈诚再度“组阁”时，连震东出任“内政部长”，成为台籍人士的第一位部长，自此形成惯例，“内政部”均由台籍人士掌管。直到 1961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上，才有 2 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央委员会。可见在最初的国民党政权结构中，对台籍人士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尽管吸收了若干台籍人士参政，从总体上看，台籍人士参政非常有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进入 70 年代之后，随着“蒋经国时代”的来临与台湾遭遇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新困境，使蒋经国遂生偏安心态，积极推展“革新保台”路线，大力起用地方人士参政。正是在此种形势下，徐庆钟成为第一位台籍“行政院”副院长，谢东闵成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一批台籍人连震东、李连春、李登辉、林金生、高玉树等也先后在“行政院”中担任要职。至 1976 年国民党十一大时，27 名国民党中常委中，已有 9 名台籍人士，占 33%。与此同时，每次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增额选举中选出的委员与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台籍人士。

进入 80 年代之后，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倾向更加明显。特别是到了蒋经国晚年，更加刻意推进“本土化”政策，并同“政治革新”结合，初步筹划了他死后的台湾权力格局，把台籍人放在较为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可从后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 31 名中常委中的比例得到说明。31 名常委中有 14 人是台籍人士，占全体常委的 45%。除“副总统”由李登辉担任外，“司法院院长”、“监察院长”、“行

政院”副院长、“内政部长”、“法务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台籍人士担任。中央党部一个副秘书长、两个工作会主任、四个副主任及台北、高雄两市党部主委也由台籍人士担任。至于县市一级以下基层党政主管，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台籍人。

由于蒋经国推展的“本土化”政策迎合了一部分台籍人参政的要求，对缓解尖锐的“省籍”矛盾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蒋经国虽大力推展“本土化”政策，但在具体做法上，始终坚持“以大陆人为主轴，台湾本省人为辅”的原则。对台籍人士开放地方政权，“中央政权”只开放次要部门，要害部门严加控制。这种状况直到1986年后才稍有改变。蒋经国这样做，既表现出与其父统治手法有很大的不同，也恃有很大的被迫因素。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就曾在一次答记者问时称：“基本上讲，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省籍的考虑，我相信有必然性”。

透视今日李登辉推展的“本土化”政策，尽管他多次宣称“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在执政后他所推展的“本土化”政策与蒋经国存有明显的差异。李登辉有自己的原则：以“台湾人为主轴，大陆人为辅”。这一原则使“本土化”政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突出表现是在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选出的31名中常委中，台籍人士有16名，占到常委总数的51.6%，加上李登辉本人约占到55%，首次突破了半数。其后在“行政院”高层机构的人事调整中，“5院”中的“3院”（“立法”、“司法”、“监察”）归台湾籍人掌管；“行政院”的8个“部长”有5个“部长”（“外交”、“财政”、“内政”、“法务”、“交通”）均由台籍人担任。在军界，台籍出身的叶竞容出任金马前线战地司令官，此种现象过去从未有过。在“中央民意机构”中，虽然大陆籍代表仍占优势，但在李登辉主持下通过的“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方案”中，已决定不再设大陆代表，“资深民代”要逐渐退休，所有增额“民代”均自台湾地区产生。此一方案实施的结果将导致在2—3年之内，“中央民意机构”也将为台籍人占据。截止去年底，资深“国代”、“立委”、“监委”均已被

迫退职。自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主政以来，经过多个回合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正朝着“非蒋化”、“多元化”、“年轻化”、“本土化”的方向，迅速发展。这一变化，既是李登辉为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也是岛内政经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

从李登辉主控政党机构的人事调整，窥视他推行“本土化”政策的主观意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通过推行“本土化”政策，以培植个人势力，扩张权势。从李登辉执政后的诸种表现来看，尽管他一再声称他从来没想到要造成“强人政治”的局面，但事实表明，他决不是一个“无野心”之人，更不会满足于做一个“虚位元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培植个人亲信，形成自己的班底。几年来，李登辉打着“提拔新进”的旗号，对国民党第三代全面开放权力。同时依靠美国和民意的支持，逐步削弱大陆籍传统势力，相继把一大批大陆籍的国民党元老政要挤出决策圈，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并形成了他的“强势领袖”和“党政一元化领导中心”的地位。

二是真正实现“台人治台”，与大陆相抗衡。“本土化”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是由台籍人主控国民党政权。尽管李登辉宣称“一个中国”，但其对大陆的感情毕竟不同于蒋经国等大陆籍政要，特别是国民党第三代中的台籍人，“台湾意识”多于“中国意识”，基本倾向是搞“一个中国两个独立政治实体”，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以对抗中共的“一国两制”。

通过上面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登辉与蒋经国在推展“本土化”政策上的共同点：都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企图通过“本土化”来强化国民党的社会根基，以维持在台统治。所不同之处是：蒋经国推展“本土化”政策只是一种“台人制台”策略的运用，而李登辉则要实现真正的“台人治台”，“本土化”政策已成为一种战略的运用；蒋经国推展“本土化”时仍念念不忘“反共复国”，李登辉则鼓吹“一国两府”、“双重承认”和“重返国际社会”；蒋经国推展“本土化”时在很